

史語所藏黃文弼寄存中瑞 西北科學考察團文物



「居廬嘗倉以郵行」漢簡（現寄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丁瑞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22 期 2011.06

壹、引言

一、「居廬訾倉以郵行」漢簡的下落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二日筆者參加王炳華「從羅布淖爾考古看樓蘭王國興衰史」的專題演講（考古學門專題演講），邢義田老師在演講後的討論中提到黃文弼（字仲良，1893-1966）發現的羅布淖爾漢簡現藏於本所庫房，已收入《居延漢簡補編》（以下簡稱《補編》）一書，^①但最重要的一枚漢簡「居廬訾倉以郵行」（以下簡稱「居廬簡」）沒找到。當時在印象中記得常任俠（1904-1996）在《戰雲紀事》^②（圖一，此為常任俠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日記的選集）中曾對黃文弼將漢簡送人頗有微詞。演講結束後筆者即翻查《戰雲紀事》，找到常任俠於一九四一年的二月十六日、三月二日，以及一九四二年的七月二十九日，這三天的日記裡清楚地記載著黃文弼將「居廬簡」送給了王世杰（字雪艇，1891-1981）。這三天日記中相關的記載如下：

1941年2月〔16日 星期日〕

赴民教館看古物展，途遇衛聚賢，邀同飲於茶肆。至古物展覽會巡看兩過，漢明器及墓磚頗夥。于右任藏墓志四百件，多精品。又王雪艇藏漢木簡一，黃文弼君所贈也。^③

1941年3月〔2日 星期日〕

與宗〔按：宗白華〕先生赴中央圖書館觀國內外報章、雜誌、善本書、石刻展，頗多見所未見。場中遇馬叔平先生，且行且談，言及中大所藏甲骨，為□□展覽損失事。馬云□與□□□，皆好出風頭，不忠實於學術。□以西北科學考察團所得漢居廬木簡贈王雪艇，亦不應該如此也。^④



圖一：《戰雲紀事》封面書影，照片人物為常任俠。

① 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補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② 常任俠著，郭淑芬、沈寧整理，《戰雲紀事》（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③ 同上書，頁309。

④ 同上書，頁313。

1942年7月〔29日 星期一〕

下午一時赴中央社觀王雪艇所藏朱德潤山水一幅頗好。又其“居盧錯倉以郵行”〔按：居盧訾倉以郵行〕木簡，乃黃文弼君西北考古所得，以贈王者。考古資料，例不能贈人，今以為禮品，失去學人之道矣。^⑤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日記中所說的民教館古物展覽會是在重慶民衆教育館舉行的，當時重慶民衆教育館館長為高笏之（1892-1963），常任俠亦有拓片等文物送展。同年三月二日的日記中，被馬衡（字叔平，1881-1955）批評的人，只要稍加比對前後的日記，便可知是黃文弼和衛聚賢（1899-1989）。^⑥

王世杰當時擔任中央設計局秘書長。常任俠對於黃文弼將漢簡當作禮物送給王世杰的行為顯然是無法接受，認為「考古資料，例不能贈人，今以為禮品，失去學人之道矣」。

「居盧簡」是黃文弼於一九三四年在羅布淖爾北岸的土垠遺址發現的，黃文弼隨即於一九三五年在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發表〈釋居盧訾倉——羅布淖爾漢簡考釋之一〉，首次刊布「居盧簡」和「交河曲倉守丞衡移居盧訾倉」簡，討論居盧訾倉的地點等相關問題。^⑦居盧訾倉的所在地，黃文弼認為「居盧訾倉不惟與樓蘭非一地，即與龍城亦非一地矣」，但「今在何所，迄無確解」。^⑧近來王炳華仔細地分析了位於羅布淖爾北岸的土垠遺址，斷定該地正是文獻所載居盧訾倉的所在地。^⑨黃文弼為何將這麼重要的一枚簡送給了王世杰，實在令人費解。

二、「居盧訾倉以郵行」漢簡現寄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前面的這些發現邢義田老師曾囑我寫下來，將來可以發表，因此持續追查該枚漢簡的下落。筆者曾試圖從王世杰的日記追查相關的記錄，但尚無所獲。^⑩二〇一〇年

⑤ 同上書，頁387。

⑥ 從常任俠《戰雲紀事》記載，一九四一年元月六日及二月廿五日的日記（見下列）可知被批評的是衛聚賢，常任俠日記中也對他多所批評。關於衛聚賢的爭議，另可見商志譚〈重印後記〉頁4注2，附於商承祚，《長沙古物聞見記·續記》（北京：中華書局，1996）。

1941年1月〔6日 星期一〕「下午，聚賢來，取去舊藏新津寶子山石棺畫像六張、磚畫兩軸、沙坪壩石棺畫像五張、鏡拓片一軸。又取去學校發掘品多種，參加民教館展覽。」（頁298-299）

1941年2月〔25日 星期二 陰雲不爽〕「□□□來還歷史系甲骨，竟被損毀二三十片，遺失七片。我之沙坪壩石棺畫像五張、新津畫像六張、畫磚兩條、鏡文一條、九石崗崖墓拓片四張、三體石經三張等件，竟亦欲吞沒，真可氣可笑也。」（頁311）

⑦ 黃文弼，〈釋居盧訾倉——羅布淖爾漢簡考釋之一〉，《國學季刊》5.2（1935）：6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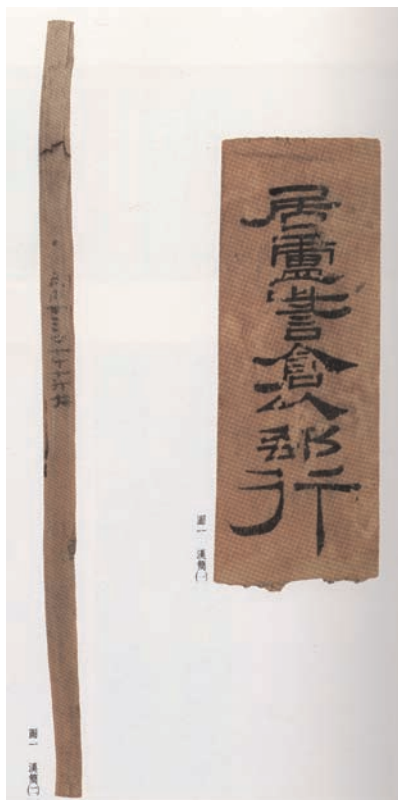
⑧ 黃文弼，〈釋居盧訾倉——羅布淖爾漢簡考釋之一〉，頁66-67。

⑨ 見王炳華，〈「土垠」為漢「居盧訾倉」故址說〉，《古今論衡》22（2011）：97-124。

⑩ 王世杰，《王世杰日記手稿本》（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七月一日終於在《王雪艇先生續存文物圖錄》（以下簡稱《續存文物圖錄》）中查到這枚重要的「居廬簡」，現和另一枚羅布淖爾漢簡寄存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⑪（圖二）這兩枚漢簡連同王世杰收藏的書畫作品計七十七件，^⑫為王世杰辭世後，其家屬於一九八八年寄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寄存的兩枚漢簡，即黃文弼刊布於《羅布淖爾攷古記》中的簡 13 及簡 42。^⑬和原發掘報告相比對，發現除簡 42 在近上端處曾折斷後再接合，其餘皆完好，實在慶幸。《續存文物圖錄》中對這兩枚漢簡的說明只列了尺寸和釋文，^⑭並未提及漢簡的原出土地，以上的這些訊息可供補充。

從常任俠的日記中，筆者原以為黃文弼只送「居廬簡」給王世杰，直到看了《續存文物圖錄》後才發現黃文弼送給王世杰的漢簡不止一枚，但實際的數量還不清楚。



圖二：羅布淖爾漢簡（現寄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引自《王雪艇先生續存文物圖錄》，圖一。

貳、史語所藏黃文弼寄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文物

黃文弼曾參與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組織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以下簡稱「西北考察團」）。^⑮西北考察團是中國近代一次大規模的聯合科學考察，也是中國學者首次與外國學者合作，並取得很多重

⑪ 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王雪艇先生續存文物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8），圖版一，漢簡（一）、（二）。

⑫ 寄存的書畫作品包括：圖二五，元·朱德潤「怡樂堂圖」，應即是常任俠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記所載：「下午一時赴中央社觀王雪艇所藏朱德潤山水一幅頗好」（《戰雲紀事》，頁387）。

⑬ 黃文弼，《羅布淖爾攷古記》（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三輯·西北史地文獻》〔蘭州：蘭州古籍書店據北平研究院一九四八年版影印，1990〕，卷三三），簡版一、四。

⑭ 《續存文物圖錄》對兩簡的釋文皆有誤，將釋文訂正如下：第一片「居廬營倉以郵行」應為「居廬營倉以郵行」；第二片「□□□□□十升大」應為「凡用卅三石十斗十升大」。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王雪艇先生續存文物圖錄》，頁191；黃文弼，《羅布淖爾攷古記》，頁428, 440。

⑮ 黃文弼參與西北考察團的調查活動，可見黃文弼遺著，黃烈整理，《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黃烈，〈艱辛的歷程 豐碩的奉獻——黃文弼先生與西北考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3（1992）：30-36。近年來學界逐漸重視西北考察團的研究，從以下略舉的論文可知：鄧云、



圖三：科學考察團中國學者合影，左起：丁道衡、黃文弼、詹蕃勛、袁復禮、徐炳昶、白萬玉、崔鶴峰、莊永成。引自《中瑞西北科學考察檔案史料》，圖版5。

要的成果，例如居延漢簡的發現。¹⁶（圖三）前述藏於本所的羅布淖爾漢簡及「居廬簡」都是黃文弼參與西北考察時所發現的，另外還有一些石窟壁畫等文物也寄存在本所。寄存本所的這批文物僅是黃文弼考察所得的一小部份，這多少顯示了西北考察團的文物曾經嚴重的流散。

一、西北考察團文物的流散

西北考察團的考察工作結束後，由於考察團成員各自原有的工作，加上一九三七年爆發的中日戰爭，考察團的考古及地質資料被安置在不同的機構，一些標本也在運轉的過程中損失了。

考察團所採集的文物，在一九三五年部份文物運往瑞典整理研究；¹⁷而留在中國的文物：

王可云，〈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考古學方面的成就〉，《山東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9.3（2007）：92-94；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檔案館、日本佛教大學尼雅遺址學研究機構編，《中瑞西北科學考察檔案史料》（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6）；張九辰，〈中國科學院接收「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經過〉，《中國科技史雜誌》27.3（2006）：238-246；李學通，〈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組建中的爭議〉，《中國科技史料》25.2（2004）：95-105。

¹⁶ 其他重要的成果可見劉衍淮，〈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之經過與考查成果〉，《師大學報》20（1975）：74-92。

¹⁷ 「出土品運往瑞典清單」（Collection of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to be taken to Sweden for Study.）現存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見邢義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古今論衡》20（2009）：26。

在中國學術團體協會理事會的組織下，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曾經撥出房間、配備工作人員，以支持整理野外考察的采集品和編寫研究報告。理事會還專門向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申請補助，以支持考察團的後續工作。為此，考察團成立了4個文獻資料整理小組：甲組，由馬衡、劉復負責整理漢簡。乙組，由黃文弼（1893-1966年）負責整理考古資料。這兩組的工作地點都在北京大學。丙組，由袁復禮負責整理地質資料，地點在清華大學地學系；丁組由丁道衡負責整理地質資料，地點在北京大學地質系。¹⁸

從這段文字記載可知，西北考察團留在中國的文物分成四個整理小組，分別進行漢簡、考古與地質資料的整理。當時黃文弼負責整理考古資料，地點在北京大學。黃文弼負責整理的考古資料，因為工作及抗戰等原因，又先後分存各地。在《羅布淖爾攷古記》〈自敘〉我們看到這樣的記載：

二十四年冬，余又奉中央古物保管會之命駐西安整理碑林。西北科學考察團亦因余故，在西安設研究分所，繼續編纂工作。……。二十六年夏，因中美庚款會補助費用完，經費來源斷絕，又適抗戰軍興，一部份採集品因參加全國美術展覽會之便即存南京。後西安時受空襲，又將存陝之採集品由於清華大學梅校長之協助移存漢口，而余之工作遂完全入於停止狀態矣。¹⁹

這段〈自敘〉談到一部分文物曾隨黃文弼的工作移置西安，後來又因為西安受到日軍空襲，由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1889-1962）之助移存漢口，至此黃文弼的工作也完全停頓。移到漢口的文物，據《馬衡日記》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日記：

黃仲良自南方歸，謂西北科學考察團存漢口劫餘文物四箱，此次解放後又損失二箱。兩年前理事會曾促其設法運存南京或上海，竟未執行。（略）後又談到將請求高教會接管此事，曾於六月杪一再商討，並已具稿，迄今三月餘，竟不投遞。聞北平研究院續聘，故爾中止耳。辦事如此，成何體統。²⁰

可見存漢口的文物劫餘四箱，一九四九年後又損失了二箱。馬衡當時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兼西北考察團常務理事，黃文弼為考察團的理事兼幹事。對於黃文弼未執行理事會促其將文物運存南京或上海一事，馬衡頗為訝異。而且在同年六月就已具稿請求高教會接管文物，黃文弼因聞北平研究院續聘而中止辦理接管的事情，更令馬衡不滿。筆者查到一九四九年六月廿六日馬衡在日記中的確記載著：

徐旭生、黃仲良為西北科學考察團事，約午餐於歐美同學會，有北大等代表及

¹⁸ 見張九辰，〈中國科學院接收「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經過〉，頁239-240。

¹⁹ 黃文弼，〈自序〉，《羅布淖爾攷古記》，頁207。

²⁰ 見施安昌、華寧釋注，《馬衡日記 附詩鈔——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故宮》（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90。

王冶秋。經交換意見，以為應由在平常務理事請求高教會接管，將考古組材料交北大整理，將地質組材料交清華整理，方是正當辦法。²¹

同年六月卅日日記：

黃仲良來，以科學考察團理事會呈高教會請接管該團文物稿見示，為改易數字。²²

從這兩天的日記可知，當時馬衡、徐旭生（徐炳昶，1888-1976）、黃文弼、北大代表，以及王冶秋（1909-1987，當時擔任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物部副部長，後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長）等人，都同意請求高教會接管這批材料，再由北大和清華來整理考古組及地質組材料，之後馬衡也看過呈高教會的函稿。馬衡為了促成其事，並於該年七月二日親自會晤湯錫予，談西北科學考察團事：

余謂無北大即無此項資料，況漢簡為絕無僅有之物，北大接受此項資料，義不容辭，亦責無旁貸。勸其以北大名義召開理事會，請求高教會接管。彼亦首肯。²³

馬衡非常希望由北大來接收這批材料，尤其是漢簡。²⁴所以親自會晤了湯用彤（字錫予，1893-1964，時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校長〕），並取得首肯。但不知何故，黃文弼未將請求接管的函送出，這當然引起馬衡的不悅。更令馬衡意想不到的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二日：

黃仲良持西北科學考察團致科學院請求接管函來請余簽名。余謂余忝為常務理事，事先毫無所聞，今強余簽署，不啻一種侮辱，最低限度亦須開一常委會，為希淵、旭生入城之便，請其任何一人召集之。²⁵

同月廿五日：

徐旭生、袁希淵、黃仲良來開西北科學考察團常務理事會，決定請求科學院接收。²⁶

改由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接收一事是在馬衡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當時中國科學院才剛成立。馬衡最終還是和徐炳昶、袁復禮（字希淵，1893-1987）、黃文弼聯名致函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1892-1978）呈請接管。中國科學院為此成立

²¹ 同上書，頁 69。

²² 同上書，頁 70。

²³ 同上書，頁 70。

²⁴ 此處的漢簡是指「居延漢簡」，而非羅布淖爾漢簡。根據中國科學院舉行的西北科學考察團結束會議所宣布的結束辦法，中國科學院接收的項目包括：「……（5）存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漢簡。」見張九辰，〈中國科學院接收「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經過〉，頁 241。

²⁵ 見施安昌、華寧釋注，《馬衡日記 附詩鈔——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故宮》，頁 99。

²⁶ 同上書，頁 100。

了「西北科學考察團結束工作小組」，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西北科學團結束會議，正式接收西北考察團的材料。²⁷

這批文物從原先決定請高教會接收，最後卻進入中國科學院。²⁸雖然張九辰已清楚說明中國科學院接收的經過，但未涉及接收前的這段轉變經過，筆者認為馬衡日記中的這些記載可作為史料的補充，因此一一錄出。而這場接收過程的轉變原因為何，也是值得探究，可能正如邢義田指出的「漢簡整理是中國近代初期學術研究的一場考驗」。²⁹

中國科學院接管這批材料後曾詳查古物、地質標本的去向，並為找回文物和資料做了很多工作：

在考察團成員的共同努力下，中科院詳細清查了古物、地質標本的去向問題；列出了已損失的采集品、流失在國外的采集品以及可能找回的資料清單；並為找回采集品及資料做了大量的工作。

瑞典方面曾於 1935 年將部分采集品運往瑞典研究。中科院接管後經多方交涉，曾由瑞典運回兩批采集品，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方保存的標本，在抗日戰爭爆發之際，考察團成員從中挑選較好的地質、考古標本 17 箱，分別運往青島和武漢，但不幸全部遺失；留在北京的標本幸得保存。新中國成立後袁復禮將標本整理後於 1955、1958 和 1975 年分別送往考古所保存。50 年代初期，考察團成員交給中科院相關研究所的古生物化石標本也有 40 多箱。中科院古脊椎與古人類研究所也保存有部分標本。³⁰

最後接收西北考察團的中國科學院雖然曾詳細清查了標本去向，但還是漏列了本所的「居延漢簡」，亦不知黃文弼寄存的西北考察團文物。黃文弼寄存的文物，除羅布淖爾漢簡外，其餘皆不為外界所知，筆者趁此機緣，將自己追查的結果，作初步的推論。

二、黃文弼寄存本所的西北考察團文物

史語所大陸考古庫房所藏黃文弼寄存的西北考察團文物，目前可確認的除了羅布淖爾漢簡外，還有十件石窟壁畫殘片，分別出於克子爾明屋佛洞、庫車庫木土拉佛

²⁷ 見張九辰，〈中國科學院接收「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經過〉，頁 241。馬衡亦參與該會議，他在當天日記：「下午二時赴科學院開會，結束西北科學考察團接收該團文物案卷」，見施安昌、華寧釋注，《馬衡日記 附詩鈔——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故宮》，頁 104。

²⁸ 關於中國科學院接收西北考察團資料的經過張九辰有清楚的敘述，參見張九辰，〈中國科學院接收「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經過〉，頁 238-246。

²⁹ 見邢義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頁 58-59。

³⁰ 見張九辰，〈中國科學院接收「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經過〉，頁 242。

洞、吐魯番柏則克里克，以及一漢漆杯。這批文物黃文弼大都已發表於《羅布淖爾攷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³¹和《吐魯番考古記》。³²

（一）羅布淖爾漢簡

羅布淖爾漢簡為黃文弼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所發現，現有五十九枚存於本所庫房，已收入《補編》，³³所以不再作介紹。要說明的是：本所簡牘整理小組核對實物後發現和黃文弼《羅布淖爾攷古記》發表的漢簡相差了十六枚，目前知道除有兩枚漢簡經王世杰家屬寄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外，還有十四枚漢簡的下落待查。

（二）石窟壁畫殘片

石窟壁畫方面，庫房現藏十件石窟壁畫殘片，其中七件黃文弼曾發表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是一九二八年發現的，分別出自克子爾明屋佛洞（圖四）及庫車庫木土拉佛洞；³⁴一件發表於《吐魯番考古記》，於一九二八年發現於吐魯番柏則克里克第八洞南壁；³⁵另有兩件壁畫殘片未見著錄。³⁶這批壁畫大都會裝框，部份壁畫的木框和玻璃罩都還在，木框上面有方形掛環，個別壁畫右下角有墨筆編號，似曾作為展覽用。石璋如（1902-2004）回憶錄中曾談到：日本佔領南京之後在史語所原址設立了博物館，日人將史語所帶不走的好家莊花土換了新的好箱



圖四：供養人像壁畫殘片（R052994）
（現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³¹ 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³² 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收入《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三輯·西北史地文獻》〔蘭州：蘭州古籍書店據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影印，1990〕，卷三三）。

³³ 見簡牘整理小組，《居延漢簡補編》，圖版 161-174。《補編》在羅布淖爾簡釋文中，每枚簡旁以小字說明各家釋文的差異，以及原簡側面的朱書編號，朱書編號大都以「LS. 序號」的方式表示。按此「LS」為「L 勺」之誤，筆者曾目驗原簡書寫的編號，確認是 L 勺。查《羅布淖爾攷古記》頁 461「羅布淖爾出土器物分部總表」註二：「凡上一字羅馬字母，代表大地名；下一字國音字母，代表出土地。此處 L 為 Lob-nor 之簡稱，下一勺字為土垠烽燧亭遺址之代名稱；以下均依此類推。」L 勺在第一次及第二次考察路線圖皆有標示。

³⁴ 見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圖版柒，圖 10，比丘像殘片（歷史語言研究所庫房典藏號〔下同〕：R052999）；圖版捌，圖 11，樂伎天像殘片（R052996）；圖版拾，圖 13，供養人像殘片（R052994）；圖版拾陸，圖 21，佛說法圖斷片（R036057）；圖版拾捌，圖 23，佛說法圖斷片（R052997）；圖版貳叁，圖 28，千佛坐像殘片（R036056）；圖版貳肆，圖 30，千佛坐像殘片（R052995）。

³⁵ 見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頁 153，圖 70，壁畫佛教故事殘片（R052998）。

³⁶ 史語所庫房典藏號：R036058、R036059。

子，頂上還有玻璃罩，照原號碼寫字。³⁷這批壁畫是石璋如在南京接收的（見下文），可能也曾經日人換裝木框和玻璃罩，於博物館裡展出。

黃文弼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記·貳遺物說明》第一部分繪畫曾說明這批壁畫的下落：

此部分以壁畫為主。壁畫多半出于拜城克子爾明屋洞中，一小部分出於庫車庫木土拉。不幸在抗戰期間毀於兵燹，現原物無存。³⁸

黃文弼說「不幸在抗戰期間毀於兵燹，現原物無存」，應是記憶有誤，他至遲於一九四六年對日抗戰勝利後即知道部分壁畫還存於南京（見下文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石璋如函黃文弼），而且塔里木盆地的壁畫至少還有七件存於史語所庫房。

（三）漢漆杯

《羅布淖爾攷古記》〈自敘〉中提及另一部份的文物「又適抗戰軍興，一部份採集品因參加全國美術展覽會之便即存南京」，這裡提到的「全國美術展覽會」是指一九三七年教育部在南京舉行的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據《燕京學報》第二十一期〈國內學術界消息·3.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的記載：

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於本年四月一日至二十日在南京國府路國民大會禮堂及美術陳列館公開覽，……。出品機關計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學考察團，……。茲略述如下：（一）圖書……，漢代西陲木簡……（三）美術工藝……4.漆器，計有西北科學考察團羅布淖爾古烽火亭出土之漢漆杯一，於漆之演進史上極為重要。³⁹

西北考察團參加第二次全國美展的展品數量我們還不清楚，但從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的居延漢簡整理文件中的「送往上海印影木簡及送往南京美展陳列品細目」簿冊裡，可知西北考察團送展的「漢代西陲木簡」至少有三件，即「永元器物簿冊」（簡號128.1）、「鄭赦寧冊」（簡號57.1）及居延筆模型，⁴⁰這三件都是貝格曼（Folke Bergman, 1902-1946）於一九三〇年所採集的居延漢簡，抗戰時並沒有留在南京，而是從北京先運到香港，再從香港運到美國國會圖書館。⁴¹

³⁷ 見石璋如口述，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紀錄，《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頁306。

³⁸ 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頁65。該書〈序言〉黃文弼亦言：「採集材料約數十箱，不幸在抗戰期間，一部分毀於兵燹。」，頁1。

³⁹ 見容媛，〈國內學術界消息·3.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燕京學報》21（1937.6）：285-286。

⁴⁰ 見邢義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頁35-36。

⁴¹ 見邢義田，〈傅斯年、胡適與居延漢簡的運美及返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6.3（1995）：921-952。

西北考察團送展的漢簡是否包含黃文弼採集的羅布淖爾漢簡我們無法判斷。可以確定的是「漢漆杯」現存史語所庫房，其上有紅色編號 L 勺 199，⁴²即《羅布淖爾攷古記》中發表的「兩耳杯」。⁴³（圖五）黃文弼認為此漆耳杯的發現極為重要，特別寫了專文〈羅布淖爾發現漢漆杯考略〉，刊於「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專刊」，⁴⁴其內容與《羅布淖爾攷古記》該器物的說明相似。⁴⁵



圖五：漢漆杯

引自《羅布淖爾攷古記》，頁 506，漆器類，插圖 1。

三、黃文弼寄存西北考察團文物的入庫經過

《羅布淖爾攷古記》〈自敘〉提到因為一部份文物是參加第二次全國美展後，因抗戰而留在南京。目前可以確認「漢漆杯」是符合此種情形下入庫的，但是在何時、經由何種方式入庫的，庫房裡並無任何相關資料，《補編》也未言及羅布淖爾漢簡入藏的經過。筆者很幸運的在史語所檔案裡找到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石璋如用「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用箋」給黃文弼的回函，⁴⁶可以確認石璋如曾經手這批文物。（圖六）

仲良先生：承

抄原函

「採集自……大小三箱」

囑代管西北科學考察團之標本

~~七號計二十二件~~。自當妥為保存，日後祈憑此函件來取為禱。肅此

敬請

旅安

後學石璋如敬上

外付存函

卅五，四，二十四

此回函應為擬稿，但清楚寫明是「代管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第一行有關標本號及件數處經刪除，刪除處旁註明：「抄原函 / 採集自……大小三箱」。此處的原函當指黃文弼的來函，黃文弼的來函尚未找到。但筆者進一步查到石璋如在當天日記上，即一九四

⁴² 此漢漆杯（紅色編號：L 勺 199）於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二日由李秉莉女士從李濟紀念館移交至大陸文物考古庫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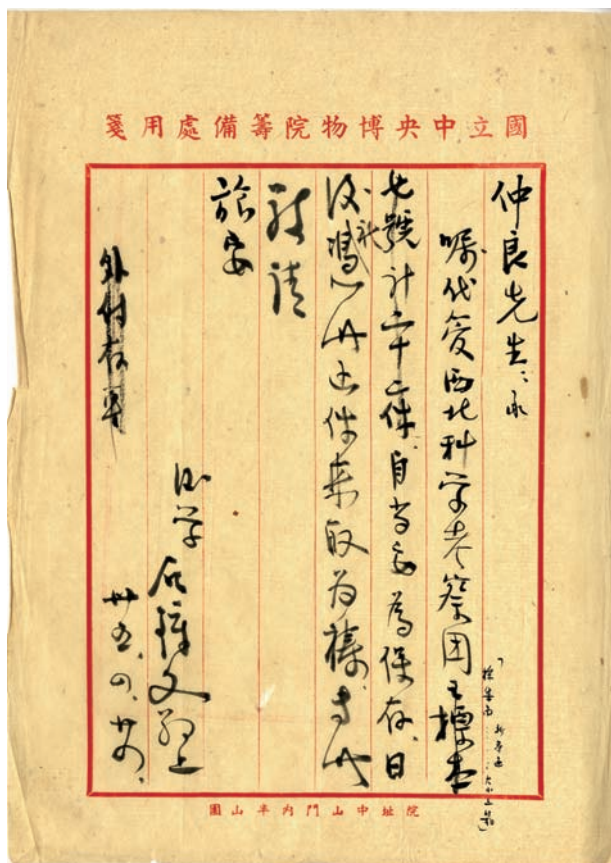
⁴³ 見黃文弼，《羅布淖爾攷古記》，頁 506，漆器類，插圖 1。

⁴⁴ 黃文弼，〈羅布淖爾發現漢漆杯考略〉，收入滕固編，《中國藝術論叢》（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頁 115-116。此書原名「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專刊」於開會期間印行，限於會場發售。

⁴⁵ 參見黃文弼，《羅布淖爾攷古記》，頁 386。

⁴⁶ 見《史語所檔案》京 5-1-5。

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清楚的寫著：「午後黃仲良來信言換個信，以當日後取物，即復一信，將物品開列其上，計大小三箱，漢簡、壁畫、模型寺一箱，又泥塑□裝二小箱。」（□表該字無法確認）此處所說的「漢簡、壁畫」當指羅布淖爾漢簡和克子爾明屋及庫車庫土木拉、吐魯番柏則克里克等處壁畫，但「模型寺」和「泥塑□」是否也存於庫房尚須進一步查證。因為庫房藏有與「居延漢簡」一同運美及返臺的善業泥，以及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夏鼐（1910-1985）參加本所發起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考古組所採集的善業泥，這兩批善業泥中是否有部分是石璋如日記中的「模型寺」和「泥塑□」還待釐清。



圖六：〈石璋如函黃文弼〉（1946.4.24），《史語所檔案》京 5-1-5。

石璋如有機會代管西北考察團文物，是因為對日抗戰勝利後石璋如曾於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時與社會所丁文治、地質所趙子銘、植物所王家楫（1898-1976）、總辦事處高玉華等人負責中央研究院在南京的接收復原工作。⁴⁷（圖七）接收工作是由蔣復璁（1898-1990）任南京接收文化事業的特派專員，負責領導接收小組，他組織了「清點委員會」，由南京各學術機構聯合組成。當時清點的文物除了中央研究院和故宮文物外：

另外也有部分隨同故宮文物南運的北京機關所屬文物。⁴⁸

清點完成的後續工作就是將文物發還各單位。除故宮、史語所的有主文物以外，還是有不少無主文物，就由接收小組發出公告，限定一定期間內由原單位及物主來提領。……。委員會決定逾期未領的無主文物統歸史語所收藏。⁴⁹

⁴⁷ 在南京接收復原工作的情形，參見石璋如口述，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紀錄，《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頁 301-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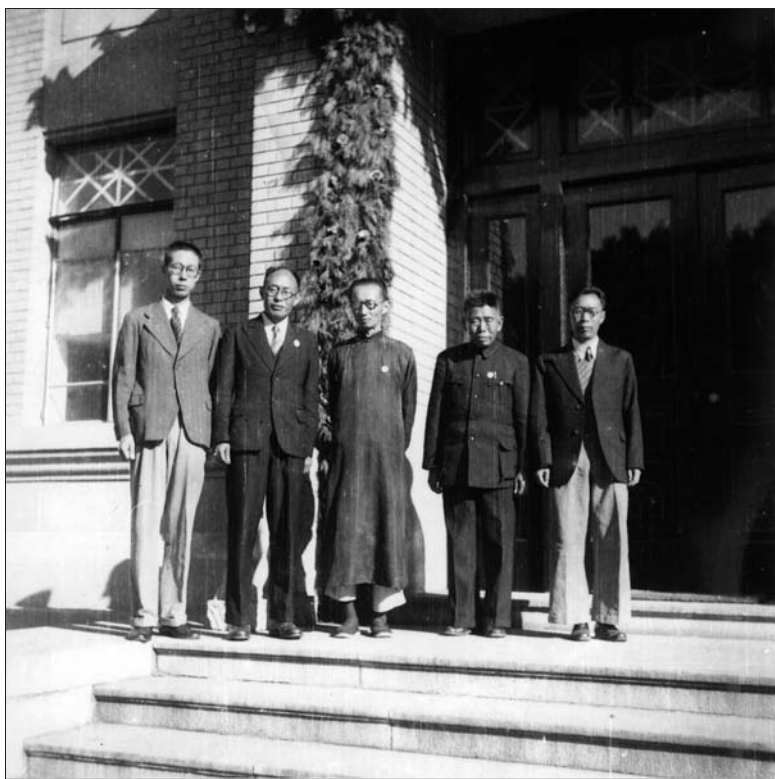
⁴⁸ 同上書，頁 305。

⁴⁹ 同上書，頁 306。

因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曾經委託我們代為接收，因此我們除了接收中央研究院外，也接收其他幾處。⁵⁰

從這些記載可知，清點的文物還包括其他機關的文物，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也委託石璋如代為接收（這似可說明為何石璋如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函擬稿給黃文弼），應該是在這種情形下石璋如也代管西北考察團的文物。而「委員會決定逾期未領的無主文物統歸史語所收藏」，除了說明本所庫房有南京接收品（如「魏三字石經殘石」）的原由，似也說明西北考察團文物可能也是屬於逾期未領的無主文物，統歸史語所收藏。

從上文的敘述，筆者初步推論，部份寄存文物是參加一九三七年在南京舉行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的展品，其後因為抗戰軍興，即存於南京。直到抗戰勝利後，一九四六年石璋如負責史語所到南京進行接收復原工作時，也接收了西北考察團的文物，並受黃文弼之託，代管了這批文物。雖然黃文弼曾與石璋如換信，作為領取的憑證。但最終不知何故，黃文弼沒有領回，所以就與本所文物一起來臺，寄存在史語所庫房了。



圖七：本院南京接收人員與日人管理人員（1945年攝），左起：谷田瀧康（日人）、趙子銘（地質所）、王家楫（植物所）、高玉華（總務處）、石璋如（史語所）。引自《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頁303。

⁵⁰ 同上書，頁308。

參、結語

黃文弼參與西北考察團所得的文物，雖然部份已損於戰亂，但所幸還有羅布淖爾漢簡、石窟壁畫和漢漆杯還藏於本所。這批文物是石璋如於中日戰爭結束後在南京接收的，黃文弼得知後，曾請石璋如代管，但最後卻沒有領回。

關於這批寄存文物雖然還有很多問題待釐清：如黃文弼為何將居盧簡送給王世杰；另外還下落不明的十三枚漢簡現藏何處；以及黃文弼為何沒有取回託管的文物等等。但是，畢竟這批文物在經過戰亂搬遷後還能倖存下來，實在值得我們好好珍惜。如果沒能好好做點研究整理工作，實在有愧於前人的努力。筆者目前只能略盡棉薄之力，將其入庫的經過做初步推論，以方便後續的研究工作。

初稿寫於 2010 年 7 月 9 日至 14 日，稚女稚子染腸病毒期間。

二稿 2010 年 7 月 29 日，三稿 2010 年 8 月 4 日。

後記：此文的撰寫首先要感謝邢義田老師的鼓勵，他常常表示我應該把在庫房工作時的發現寫出來。適值王炳華先生大作〈「土垠」為漢「居盧訾倉」故址說〉發表時，邢老師囑我撰寫，讓拙文得以續貂。考古學門召集人陳光祖先生協助追查寄存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漢簡的現狀，並鼓勵我寫成文章，在此一併致謝。